

## ※ 書目文獻 ※

# 《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 佚文考

董志威\*

我在研究早期牟宗三先生思想的時候，通過「全國報刊索引」網站及「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又稱為「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發現了一批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sup>1</sup>中，且亦未在《鵝湖月刊》上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以不同的署名在一九三〇及一九四〇年代發表，其中屬於一九三〇年代的有二十一篇，屬於一九四〇年代的有二篇，共二十三篇。它們均未被學者注意並研究過。各篇篇幅長短不一，最長者達二萬五千字之多，最短者僅三百餘字，多數為數千字。另外，李強先生亦發現並整理了多篇佚文，當中有些與我的發現是重複的，有些則沒有重複；其中還沒有整理的三篇文章，由李明輝先生委託我來整理。這些文章對於全面研究牟宗三先生早期思想和經歷的學術工作來說，是很寶貴的第一手文獻。我將它們整理出來，共二十六篇，並對它們的真實性做簡單的考證與說明。此外，我也對李強先生發現的佚文之整理情況做了說明，共有七篇新發現的佚文。

### 一、各篇文章之標題、署名及所發表期刊和時間

整理出來的二十六篇新文獻大體情況如下：

1. 〈召集臨全代會之真義何在？〉，光君，《正論周刊》，第9期，1933年4月29

---

\* 董志威，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sup>1</sup>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上、下)，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第25-26冊。

- 日。
2. 〈從詩詞方面研究中國的人生典型〉，牟宗三，《行健月刊》，第5卷第2期、第3期，1934年8月15日、9月15日。
  3. 〈從水滸傳到青紅幫〉，牟宗三，《行健月刊》，第6卷第1期，1935年1月15日。
  4. 〈論讀經〉，牟中離，《論語》半月刊，第65期，1935年5月16日。
  5. 〈青年與社會〉，光君，《禮拜六》，第605期，1935年8月31日。
  6. 〈關於中國農村的現狀〉，牟宗三，《自由評論》，第4期，1935年12月14日。
  7. 〈中國人與不容中律〉，牟離中，《宇宙旬刊》，第5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
  8. 〈《明日之中國文化》書評〉，牟離中，《宇宙旬刊》，第5卷第5期，1936年6月25日。
  9. 〈《認識論的多元論》書評〉，牟離中，《宇宙旬刊》，第5卷第6期，1936年7月5日。
  10. 〈從公有到私有〉，光君，《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7年3月1日。
  11. 〈編者後記：談本刊態度〉，編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7年3月1日。
  12. 〈說自己的話〉，記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7年3月1日。
  13. 〈編者後記：談本刊目標〉，編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7年4月1日。
  14. 〈評現行大學教育〉，記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7年4月1日。
  15. 〈編者後記：談戰爭〉，編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3期，1937年4月15日。
  16. 〈加拿普：《言語之邏輯句法》書評〉，光君，《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7年5月1日。
  17. 〈一個開明階段是必須的〉，記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7年5月1日。
  18. 〈編者後記：談國家哲學與社會學〉，編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6期，1937年6月1日。
  19. 〈輿論的造成與保障〉，記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6期，1937年6月1

- 日。
20. 〈編者後記：談輿論〉，編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7期，1937年6月15日。
21. 〈廬山禮賢之政治意義〉，記者，《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8期，1937年7月1日。
22. 〈論因果〉（為李強先生所發現），牟宗三，《華文月刊》，第2卷第1期、第2-3合期，1943年1月15日、7月15日。
23. 〈邏輯之「必」與實事之「必」〉（為李強先生所發現），牟宗三，《華文月刊》，第2卷第4-5合期，1943年。
24. 〈論構造〉，牟宗三，《中國文化（璧山）》，第1期，1945年9月15日。
25. 〈解惑〉（為李強先生所發現），編者，《歷史與文化》，第3期，1947年8月1日。
26. 〈知識階級之命運〉，牟宗三，《天文臺》，第2卷第1期、第2期，1948年6月26日、7月14日。

其中，發表於《再生》雜誌上署名「編者」的五篇文章均只註明「編者後記」而沒有關於內容的標題，標題係筆者根據其內容所加。

此外，除了以上二十六篇發表於各期刊上的文章之外，還有一篇文章對於研究牟宗三先生早期的政治思想與自然哲學思想，以及他與張君勱先生之關係的問題而言，非常重要。這篇文章就是牟先生在《五十自述》<sup>2</sup>〈第五章：客觀的悲情〉中所說的「在廣西，彼〔按：指張君勱先生〕寫《立國之道》<sup>3</sup>，最後一章〈哲學根據〉，亦吾所寫」這句話所指的文章。我查閱張君勱先生所著的一九三八年桂林版《立國之道》一書，從目錄上看，牟先生所說的「最後一章〈哲學根據〉」指的是該書的最後一編最後一章〈我人思想之哲學背景〉。該書〈自序〉末尾標記「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張君勱識於桂林，時在由漢赴蜀道上」，而該書出版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同時，在該書〈凡例〉第五條中說「此書寫於漢口，時在二十七年五月至七月」。而當時牟先生正在廣西梧州中學任教。所以，我推測張先生攜書稿在桂林時與牟先生相見，然後將牟先生所寫的「最後一章〈哲學根據〉」合併起來，在桂林

<sup>2</sup> 牟宗三：《五十自述》，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

<sup>3</sup> 張君勱：《立國之道》（桂林：商務印書館，1938年初版，1947年第4版）。

出版。

這篇文章可能由於沒有單獨發表，而是被編在張君勳先生的著作中出版，而被視為張先生的著作，不被研究牟先生思想的人所注意與引用。但是，這篇文章對於研究早期牟先生的政治思想與自然哲學思想的轉變過程極為重要。因為在這篇文章中，牟先生還是以懷特海的思想為根本依據。但也正是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這兩年困厄時期，根據《五十自述》第四章所述，牟先生由對邏輯和數學之「第一義」的鑽研而悟入「認識主體之門」；從而領會到「康德哲學之大體規模」，使自己「真正進入哲學之域」。因此，在完成了這篇文章的一年之後，牟先生又藉再次主編《再生》雜誌的機會，作〈時論〉七篇，系統地闡述自己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這便使他與以前所認同的張君勳國家社會主義之主張有所不同。這種思想上的不同，而非僅僅人情上的衝突，使他最終與張君勳的國社黨事業分道揚鑣，而歸入熊十力的現代新儒家陣營中。因此，牟先生所撰《立國之道》的最後一章是一篇具有總結性的文章，總結了牟先生身為國社黨黨員時的基本思想。鑒於這篇文章的特殊意義，我也將它從張君勳先生《立國之道》一書中抽出來，作為研究早期牟宗三思想轉變過程的第一手文獻。

## 二、關於二十六篇新發現文獻的真實性考證

所謂「真實性考證」就是確定它們的確是牟宗三先生的作品。這二十六篇文章中，所有署名「牟宗三」的七篇文章無疑是他的作品。由於牟先生字「離中」，所以署名「牟離中」的三篇文章也可以確定為牟先生的作品。另外，第四篇署名「牟中離」的〈論讀經〉小文章（長約一千一百餘字）從署名上看，也很可能是牟先生的作品。那麼，如何確定呢？我們發現了一篇署名「中離」的文章〈說觀念〉，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再生》第三卷第四、五合期中。同時，這篇文章也收入在《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上）》中，並在文末標註「原載《民國日報·哲學週刊》第二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署名『離中』」。也就是說，「中離」就是「離中」，只是《全集》版不知該文章最早是以「中離」之名發表於《再生》雜誌的。既然「中離」是「離中」，那也就是牟宗三，那麼「牟中離」就更是牟宗三了。況且細讀全文，也能感受到牟先生青年時期的文風與辭氣。這篇文章很有趣，它反映了牟先生青年時期對儒家經典及讀經的態度，很值得一

讀。

除了以上十一篇文章可以直接或明顯地確定為牟先生的作品之外，其餘十五篇從署名上難以直接確定，需要根據其中的內容和思想來加以確定。

首先是四篇署名「光君」的文章。在《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中也收有三篇署名「光君」的文章，即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發表於《再生》第三卷第一期的〈中國土地分配與人口分配之原則〉、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發表於《再生》第三卷第二期的〈任重而道遠〉，以及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發表於《再生》第三卷第八期的〈國內兩大思潮之對比〉〔按：該文章又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發表於《宇宙旬刊》第四卷第一期，《全集》編輯只知其發表於《再生》〕。可見「光君」也是牟先生早期常用的一個筆名。因此，這新發現的四篇署名「光君」的文章也很可能是牟先生的作品。不巧的是，我在「全國報刊索引」網站數據庫中以「光君」為「作者名」而進行檢索時出現三十六條紀錄，經分析，可以確定它們不是同一個人的作品，而是至少三個人的作品。這三十六條紀錄中，有二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從時間上可以排除與牟先生的關係），二條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從內容上可以排除與牟先生的關係），一條發表於一九四七年（從內容上可以排除與牟先生的關係），十七條發表於一九四八年，以及七條發表於一九四九年（這二十四條乃是同一人的作品，從內容上可以排除，因為它們都是宣傳蘇俄和共產黨主張的）。剩下的七條便是上文所列出的四篇和《全集》中收錄的三篇，這七篇發表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

其中，署名「光君」的〈從公有到私有〉一文開頭一句就說：「我曾在《再生》二卷四期上發表了一篇〈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改造現社會〉。」其所提到的這篇文章收入《全集》中，署名「牟宗三」，可見〈從公有到私有〉一文確是牟先生的文章，而且是其關於中國古代農村經濟制度的系列文章之一，內容很重要。

署名「光君」的〈加拿普：《言語之邏輯句法》書評〉一文從內容和發表期刊上也可以斷定是牟先生的作品，不必多說。因為這個時期的牟先生主要關注邏輯問題，並深受羅素、維根斯坦及維也納學派的影響。

有問題的是，署名「光君」的〈召集臨全代會之真義何在？〉（1933年4月29日）和〈青年與社會〉（1935年8月31日）兩篇文章是否是牟先生所作呢？首先，這兩篇文章的內容都與共產黨無關，因此其作者不是上文提到的那個宣傳蘇俄和共產黨主張的「光君」。細讀之下，從文風與辭氣上很像牟先生同期的文章類

型；但從內容上看，卻沒有明顯的字面上的證據可以證明是牟先生的文章。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兩篇文章的思想和主張，並且與《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sup>4</sup>和《五十自述》中的相關內容加以比較，來進行推定。

〈召集臨全代會之真義何在？〉這篇文章是一篇時論性文章，是對當時準備要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這一政治事件的評論。在文中，作者稱國民黨為「本黨」，並自稱「我們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他反對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少數國民黨執政者，稱他們是「中國法西斯蒂」、「破壞本黨總理之遺教」的人，主張「抗日救國」。作者還批評「橫行歐洲的國家社會主義」，批評「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國之希特勒」等「法西斯蒂」。這種態度和張君勳先生的國社黨主張與傾向也不同。張君勳先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立國之道》一書中對希特勒等人是持讚賞和崇拜態度的。他在該書第五編〈政治家〉的第一段中說：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撕毀凡爾賽條約，恢復其整軍經武之主權。凡此實例，彰彰明甚。他們都是世界上的人物。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人物，自可由衰弱而強盛。<sup>5</sup>

這樣看來，這個作者「光君」可能會是牟宗三先生嗎？

在《五十自述》第二章〈生命之離其自己的發展〉中，牟先生敘述了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的「革命」經歷。《五十自述》中說：

十九歲我到了北京，政治文化的中心地。離家更遠了，正式投入了大都市。暑期考進北大預科。那年秋國民革命軍打到了北京，改名為北平。中華民國進入一個新時代。<sup>6</sup>

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記載：「民國十六年(1927)，丁卯，十九歲。是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所以，牟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到了北京，並在暑期考進北大預科。《五十自述》中又說：

那時是民國十七年〔按：1928年〕，我春天到北平，混沌懵懂，一無所知，我只隱隱約約聽說王國維〔按：王國維逝世於1927年6月2日〕於初夏跳頤和園昆明池自殺了，梁任公隱身於天津，藏起來了。<sup>7</sup>

<sup>4</sup>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

<sup>5</sup> 張君勳：《立國之道》，頁325。

<sup>6</sup> 牟宗三：《五十自述》，頁21-22。

<sup>7</sup> 同前註，頁22。



牟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剛好趕上北伐戰爭和第一次國內革命熱潮一片高漲之時，混沌懵懂的他也受到了這種熱烈氛圍的影響，並成為國民黨的預備黨員，積極參加並組織民權運動。他在《五十自述》中說：「他們〔按：指國民黨人〕把我列為預備黨員。我暑期回家，團聚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每夜召集他們開會講習，訓練民權初步。」但是不久他便「感到不對勁」，不再積極參加「革命運動」。他在《五十自述》中說：「我從十七年國民黨所帶來的革命運動中的氾濫浪漫轉向而為一般思想觀念的氾濫與浪漫。」這種「一般思想觀念的氾濫與浪漫」就包括「革命思想」，即從「革命運動」的實踐轉向「革命思想」的觀念。

那麼，作為國民黨預備黨員的青年牟宗三之「氾濫而浪漫」的「革命思想」保持了多久呢？這個問題在《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和《五十自述》中並沒有明確的說明，而且《五十自述》中的敘述會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牟先生的「革命」熱情只是「一陣風」似地很快就過去了。但是，「革命運動」的熱情可以很快地過去，而「革命思想」這個觀念卻很難一下子消除。牟先生關於社會和政治的思想，是如何從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三民主義的革命思想，轉變為張君勱先生的國社黨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建國思想？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因為「革命」這個觀念一旦進入了人的心裏，尤其是青年的心裏，便很難擺脫。感性而衝動的人們，尤其是青年，總會想當然地認為唯有「革命」才能夠解決社會和國家的問題。從「革命」的觀念轉向「建設」的觀念是很難的。在《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上記載有：「民國二十二年（1933），癸酉，二十五歲。是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以及：

民國 23 年（1934），甲戌，二十六歲。秋，赴天津，住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張東蓀、羅隆基二氏常相過從。此時或稍前，以張東蓀氏之介，列名國家社會黨。<sup>8</sup>

由此，我們知道牟先生在整個大學期間（從一九二七年暑期到一九三三年暑期，包括兩年預科和四年本科共六年時間）可能都是從「國民黨預備黨員」的政治立場對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因為他是在畢業近一年之後才加入國家社會黨。從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思想，到國社黨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建國思想的轉變，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意謂著政治思想和人生追求上的一個重大轉變。

經過以上討論，我們至少不能排除這個「光君」是牟宗三先生的可能性；而且

<sup>8</sup>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 5。

更進一步，我認為這個「光君」就是大學時期作為國民黨預備黨員，並主張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的牟宗三先生。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是牟宗三先生的社會和政治意識萌發和起源之處，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一旦我們確定了這一點，那麼對於了解大學時期青年牟宗三的社會和政治思想狀況來說，〈召集臨全代會之真義何在？〉這篇文章便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它是我們所見到的唯一一篇涉及牟先生當時政治思想和主張的第一手文獻。

〈青年與社會〉一文發表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這時的牟先生已經加入國家社會黨一年多了，而且積極參加國社黨活動，為黨效力。例如《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上記載：「民國二十四年(1935)，乙亥，二十七歲。秋，返棲霞小住，後赴廣州，任教於私立學海書院。」私立學海書院是由國家社會黨創辦的。當時張君勱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後來在國民黨的壓迫下放棄大學教職，創辦私立學海書院。但後來，學海書院也被國民黨封殺了。《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上記載：「民國二十五年(1936)，丙子，二十八歲。夏秋之間，學海書院因故結束。先生北返……乃回棲霞故里小住，後赴北平。」第二年(即1937年)初，牟先生擔任國社黨機關刊物《再生》雜誌主編一職，恢復此前已經停刊一年之久的《再生》雜誌，並從月刊改為半月刊。該刊從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共出了九期，由於七七事變引發全面抗戰而再度停刊。這在《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和《五十自述》上都有記載和敘述。這說明，牟先生青年時期很熱衷於政治活動，對於政治是很認真嚴肅而且積極的，並且其工作主要集中在思想與輿論方面。在這個背景下來看〈青年與社會〉這篇小文章の思想和主張，我認為這個作者「光君」也是牟宗三先生。在這篇小文章中，作者說明了「青年」和「社會」的關係，認為：「社會是抽象的東西，可是因為有人類的生活或是活動而具體化了。青年又是人類中最優秀的份子；與其說社會不能沒有人的活動，不如說不能沒有青年的活動。」這裏的「抽象」、「具體化」、「活動」等詞語都是那時牟先生文章和思想中的關鍵詞。然後這篇文章回顧了「興師北伐的前幾年的情形」，說：「那確實可以稱得是革命的黃金時代。凡是革命的青年，誰不都是緊貼著社會，而社會也在熱烈地接納青年。」接著就講到，由於革命熱潮的過去，時勢轉變導致當下青年與社會的相互脫離和遺棄。最後呼籲青年，重新「關心社會」並「衝破」眼前的黑幕。這些思想與先身為國民黨預備黨員和此時國社黨員的牟宗三的思想是吻合的。因此，我認為〈青年與社會〉確實是牟先生的作品。



以上十五篇新發現的文章都可以通過署名為線索來判定是牟先生的作品，因為這些署名都在《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中出現過。但是另外十一篇署名「編者」和「記者」的文章是否也是出於牟先生之手呢？這在《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中沒有線索可尋。不過，從以上所述的牟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主編《再生》雜誌的事實，以及這五篇署名「編者」的文章內容與風格可以推測，它們都是牟先生主編《再生》雜誌時對當期關鍵內容的總結和評論。這是符合牟先生辦雜誌的思路和方法的。牟先生在主編《再生》雜誌之前一年，在廣州學海書院時期也曾接替張東蓀先生繼續主辦《民國日報·哲學週刊》，並發表過〈一年來之哲學並論本刊〉的文章，對其所主辦之《民國日報·哲學週刊》進行總結與說明。此文發表之後，該刊即停刊。半年之後，牟先生再次主編《再生》雜誌時應該會繼續堅持他自己已經積累起來的編輯經驗，並有自己的編輯方法和宗旨，這很符合牟先生的做事風格。所以我認為這五篇〈編者後記〉就是牟先生的作品。

同時，在牟先生主編的《再生》雜誌第一期的開篇，便是署名「記者」的〈說自己的話〉之聲明：

國內目前的刊物真如汗牛充棟那樣多了。可惜除了營業關係的以外，幾乎是其中言論都有背景。他們被實際的勢力在暗中決定著，支配著。貌看上去，好像是言出由衷。而深按下去，便見其字裏行間透露出一種類似無線電的味兒來。無線電雖在那裏廣播，却不是自己說話，乃另有個人在背後開口。我們以為必須先有內心的自由，方可再求發表的自由。言論的可貴即在其本身，不是替人家作機器。所以我們現在也只想說我們的話。心中有話，如鯁在喉，不能不吐。所以不能不吐乃是為理性所示，良心所責。不必預計以後究與那一面有利或有害。因此我們不能儘在一二個標語之下打迴旋。我們要的是自主的自由。現在願以此來試探中國究竟容許有這樣的自由與否。

這一點意思且寫在第一頁，讀者若當作序言看，亦未為不可。

這種風格豈不很像牟宗三嗎？於是，以後的多期都有這樣的「記者」之「自己的話」，對大學教育、政治開明、輿論自由、政治時事等進行獨立自主的評論。因此，我認為這五篇「記者」之文和「編者」之文一樣，都出於牟先生之筆。

另外，第二十五篇標題為「解惑」，署名「編者」的文章，則是牟先生在獨立創辦《歷史與文化》月刊時，為回應讀者之批評與疑問而作。此事在《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上有記載：「民國三十六年(1947)，丁亥，三十九歲。一月，先生懷於

國運之屯艱，文運之否塞，乃獨立創辦《歷史與文化》月刊。」

以上是我對新發現的二十六篇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的牟先生早期佚文之情況和真實性的簡單考察和說明。我相信它們對於研究牟宗三先生早期思想和經歷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了以上所說的二十六篇文章及《立國之道》末章〈哲學根據〉一文這二十七篇文章之外，李強先生也發現了十六篇牟先生早期佚文，其中有些與我發現的重複。它們分別是：

1. 〈中西兩大社會思潮之評判〉，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13期，1933年2月6日。
2. 〈合理與革命〉，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14期，1933年2月13日。
3. 〈辯證法總檢討〉（分三部分分期發表），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32、33、34期，1933年6月19日、26日、7月3日。
4. 〈讀懷悌海著的《理想之前進》〉，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36期，1933年7月17日。
5. 〈盡能與法執〉，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62期，1934年1月15日。
6. 〈國土〉，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65期，1934年2月5日。
7. 〈風尚〉，牟宗三，《益世報·社會思想》（天津），第66期，1934年2月12日。
8. 〈從詩詞方面研究中國的人生典型〉，牟宗三，《行健月刊》，第5卷第2期、第3期，1934年8月15日、9月15日。
9. 〈從水滸傳到青紅幫〉，牟宗三，《行健月刊》，第6卷第1期，1935年1月15日。
10. 〈從公有到私有〉，光君，《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7年3月1日。
11. 〈論構造〉，牟宗三，《中國文化（璧山）》，第1期，1945年9月15日。
12. 〈加拿普：《言語之邏輯句法》書評〉，光君，《再生》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7年5月1日。
13. 〈論因果〉（分兩部分分期發表），牟宗三，《華文月刊》，第2卷第1期、第2-3期合期，1943年1月15日、7月15日。

14. 〈邏輯之「必」與事實之「必」〉，牟宗三，《華文月刊》，第2卷第4-5期，1943年。
15. 〈解惑〉，編者，《歷史與文化》，第3期，1947年8月1日。
16. 〈知識階級之命運〉，牟宗三，《天文臺》，第2卷第1期、第2期，1948年6月26日、7月14日。

在這十六篇佚文中，李強先生與我共同發現並重複整理的，有其中的第九篇、第十篇、第十六篇這三篇。由李強先生發現而我受委託整理的，有其中的第十三篇、第十四篇、第十五篇這三篇。我亦發現並獨立整理的，有其中的第八篇、第十一篇、第十二篇這三篇。李強先生還整理了前七篇，這七篇文章均署名「牟宗三」，故可以確定是牟先生的作品。

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從標題上看像是兩篇獨立的文章，但是從它們的內容上看，可知兩篇文章實是一篇文章的上下兩部分，第一篇為其中的A、B、C三節，第二篇為其中的D、E兩節；而且這兩篇文章發表在同一報刊《益世報·社會思想》的相連兩期上。但是由於這兩篇文章各自冠以自己的標題，並沒有一個總標題，不像其他文章雖分部分而發表在連續的不同期次上，但皆以同一標題加以發表，故我仍尊重牟先生的本意，不將它們合為一篇，而仍分為兩篇。在此特加以說明。

第三篇文章〈辯證法總檢討〉在牟先生〈辯證唯物論的制限〉一文中曾提到：「B4.2……關於這種道理，我在〈辯證法之總檢討〉及〈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兩文中已詳細指正出它不能以矛盾來論，它不能以正反合來論。」故這篇文章對於研究牟先生早期關於辯證法的思想，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四篇文章〈讀懷悌海著的《理想之前進》〉一文在文末標有「未完」二字。該文章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社會思想》第三十六期上。但是經過李明輝先生的助理王又仕先生查閱該期其他部分及以後的各期，均未發現該文的後續部分。所以，該文很可能像牟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的〈公孫龍子的知識論〉一文一樣，是一個殘篇，但是，不知道究竟是沒有作完整？還是沒有發表完整？不過，幸運的是，這篇文章的大體內容俱在，欠缺的部分可能只有幾段而已，應該不會有一篇文章的長度。

此外，尚有一篇文章只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三十二冊中《牟宗三先生著作編年目錄》中提到過，但是並沒有收入《全集》中，也未見於《生命的學問》一書

中。這篇文章便是《牟宗三先生著作編年目錄》中編號一一五的〈關於理性的理想主義諸問題——謹答孫應復先生〉一文，發表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自由世紀》第三期。我在互聯網上偶然發現了已整理好的該篇文章。這篇文章雖非完全未知之佚文，但也應該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

因此，由李強先生整理的七篇文章，加上由我整理的二十七篇文章，以及由他人整理的一篇文章，共有三十五篇佚文未出現在《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其中有三十三篇連標題亦不見於《全集》中，完全不為學界所知。目前這批牟先生早期的文章正由李明輝先生及其助理王又仕先生編輯中，希望能早日出版，嘉惠關心牟先生思想與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者。